



被“关”在家里的中国人，将互联网当作了主要的消磨时间的平台，由此，特别是牵扯到疫情的任何一个话题，都更易迅速成为焦点，关注度成倍扩大。

乙方在感叹；甲方察微渺，乙方顾宏观；双方不时左右互搏，各自嘲讽着对方的“阴谋论”。

面对如此巨大的事件，大家罕有表现出两难的纠结和道理的背反，而是都认为己方才洞若观火，才掌握着不言自明的真理。膨胀的符号包裹着浅显的见解，却自认积极投身抗疫神话建构的流程，传递了勇猛和正义。激情，代替了理智的思考。

这种激情，与其说里面夹带着多少公共道理，不如说它是一种表达上的“艺术形式”，呼之欲出的情感价值、风尚指向，粉饰了其过于急躁的判断。

人们得承认，大大小小的差异和分歧，引导着日常的抉择，构成了社会的多样性、矛盾性。没有人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掉所有纷争，激情的言论说出口简单，在协商里寻找调和之策、共进之道，难——而“调和”与“共进”，方为最实际的、推动社会运转的办法。

狂热的火焰，为何如此轻易地燃烧着我们的头脑？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高隽对记者剖析：“任何一个公共话题的论辩双方，若欲进行思考深入、说理充分的对话，首先需要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对话空间，在这个空间之中，当事人面对面陈述各自的想法与观点，且不对对方做人格、智力、道德、价值观上先设的评判，且愿意暂时放下自己的立场，做一定的换位思考，否则对话是无法成立的。而此次疫情让人感到似乎呈现出更为极端的看法，从心理学视角来看，或有以下四点原因。”

第一，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里，因伴随的心理危机之故，人们处于一系列强烈的情绪体验当中，尤其是焦虑和惧怕。每一个人，都不同程度地体验到了安全感（命如累卵、尊严褫夺、信任危机等）的威胁。在这样高情绪卷入的情况下，我们很难运用换位思考的能力，也就很难接受别人的观点，并倾向于固化自己的立场，甚至使得自己的立场变得更极端，用以维系内在结构的稳定。

第二，本次疫情的波及面很大，并且伴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，这样的话，就人人自危，很容易产生一种寻找终极“凶手”的冲动。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确定的对象，令其承担相应责任，这也是公众愤怒背后的一种认知需要。不确定性和愤怒会放大内外团体

的区别和隔阂，产生类似“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立场不一样，我们就不是一路人，就要划清界限”的情境。

第三，大家被“关”在家里，发生论辩，还是要通过网络。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，使得真人和真人间实为分隔的状态，无法直面对话对象，易致“去人性化”——通俗的讲，就是不把对方当成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看待。一般，当面论辩时，人们不至于那么地急于人身攻击，不至于那么地无视“你”和“我”基本类同的地方。网上论辩，隔着屏幕，谁在乎谁是谁？一些基本的“刹车机制”，比如说能看到对方的面部表情，能觉察对方的情绪体验等等，都一概失灵了，暴戾易叠加。

第四，网络传播的特点除虚拟性和匿名性之外，也极易出现群体情绪传染的现象。一种情况是，当事人会觉得好多人都在反对自己，但也有不少人是支持自己的——不同的阵营就此“拉帮结派”，互相攻击。另一种情况是，某个话题容易吸引一些持相同观点和态度的人，彼此的情绪相互渲染，出现集群现象，假如这一群体集体攻击某个当事人，那么所谓的“网络霸凌”就会发生。但事实是什么呢？事实是就算论辩的话题最终有百万人次介入了，这点数量，与国家总人口数相比，依然“沧海一粟”。

高隽指出，疫情如放大镜，它把生死的事情搁你面前，人们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的碰撞，代际之间的碰撞，阶层之间的碰撞，夹杂着疫情所激发的各类情绪，遂显得极端。但是，随着疫情逐渐消退，绝大多数人还是会回归朴素的生活轨迹。“比较棘手的，是疫情严重地区的灾后心理援助问题。除了患者和患者家属外，像医护人员、军警、社区工作人员等活跃在社会治理第一线的人员，你怎么去更好地给他们提供社会心理服务，让他们能从本次危机中恢复过来，以免出现各类与创伤有关的心理困扰？这是一道难题。”她补充道。

诚然，“禁闭”的影响，无论从历史学、政治学等剖面上，还是从社会学、心理学等剖面上，都贯穿着一场大疫的始终，给我们留下意味深长的余音。不过，只要人类努力实现普遍的良知与仁爱、开阔的胸襟与视界、辩证的逻辑与思维、专业的素养与精神，漫漫长夜度过，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，亦是绝不吝于向我们播洒新一轮希望的光辉的。☀